

国家图书馆藏海外青铜器图录述要（1900—1949）

□ 曹菁菁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中国的金石学作为古物研究的重要学术形式延续了很长时间，对于青铜器图像的著录在清代也繁荣发展，诸如《西清古鉴》等皇家铜器的图录、《两壘轩彝器图释》《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等私人藏器图录也是当时重要的青铜器图录，记录了有清一代金石学发展中对于青铜器图像的采集与研究。

随着摄像技术的发展，青铜器的图像记录方式和复制方式都有

了新的手段，青铜器全器影像的获得与传播变得较为便利。与此同时，西方考古学兴起，考古学的发展以及欧洲等国在殖民过程中对异国的考古发掘极大地激励了欧洲本土对于东方艺术史的研究。19世纪末，西方旅人将中国青铜器带回欧洲大陆及20世纪元年日本古董商把中国青铜器推介到欧洲大陆后^①，其艺术形式和艺术质地让欧洲学者们理所当然地将中国青铜器与希腊青铜时代的各种作品加以比较。毫无疑问，中国的青铜器艺术很快征服了西方艺术投资者和学者。在庞大的市场诱惑之下，中国青铜器源源不断地输入欧洲市场。

1900年至1949年间，中国国内及海外涌现了关于中国青铜器的大量图录，其体量竟然比中国历代青铜器图录的总和还多。海外关于中国青铜器的专门图录在这个时期从无到有。最早的专门收录中国青铜器的外文图录始于1903年日本编辑的《帝室博物馆鉴赏录·古铜器》，此后一直处于在空白阶段，直至1911年之后，专门著录中国青铜器图像的日文及西文图录才大批出现。

在此，我们必须强调，20世纪初中国国内各遗址的青铜器大量发现，绝对不是因为历史恰好在这一时期碰上了“地不爱宝”的“幸运期”，而是有清以来青铜器收藏的持续热度，以及1911年以后欧美世界对于中国青铜器的大量收购需求，刺激了青铜器的盗掘，同时西方考古学科在学术界的引入，也促进了中国本土学者及考古学者们对中国各个遗址开展了各种调查和发掘。

本文并非力图蒐集全面的海外出版的中国青铜器影像资料，仅为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民国时期的海外青铜器图录进行简要的介绍，希望提供给读者1900年至1949年之间在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青铜器图录出版状况，并尽可能地提请读者注意这些海外青铜器图录作为一个文

^① 法国经济学家赛尔努什（H. Cernuschi）最先于19世纪晚期到中国采购青铜器。文献可考最早将中国青铜器卖给欧洲人的乃是日本古董商人林忠正，他最迟于1900年前后将若干中国青铜器卖给了德国人。参见 Otto Kummel: *Chinesische Bronzen aus der Abteilung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an den Staatlichen Museum Berlin*, Berlin, 1928, p.3.

献群体所揭示的学术史脉络,重新思考传统“金石学”与西方考古学、艺术史学的关系及其在现代学术结构中的融合结果。

一、日本编纂中国青铜器图录举要

《帝室博物馆鉴赏录·古铜器》

建设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一项重要举措。鉴于1872年日本首次国内博览会的成功,政府开始仿效西方建设公众博物馆。1889年,博物馆改名为“帝国博物馆”,其藏品日益增多。除却东京上野的本馆之外,京都和奈良也都建有分馆,均称“帝国博物馆”。帝国博物馆起初的展览主题主要为:日本文物、矿物、动植物、农业等。冈仓天心任博物馆美术部长之后,博物馆对于美术的收藏与陈列日益偏重。1900年,位于东京、京都、奈良三地的“帝国博物馆”同时改称“帝室博物馆”。1903年4月至5月,帝室博物馆举办了青铜器珍品特展,从当时日本国内收藏大家处挑选了青铜器精品借以展出。1906年,帝室博物馆选择了其中最珍奇的38件展品拍摄了照片,又择选了一些时代虽晚但品类罕有的展品摄影并附在“别录”,是为《帝室博物馆鉴赏录·古铜器》及其《解说》。^①这是日本最早的刊印中国青铜器照片的图录,也是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图录。全书照片用金属照相法印刷,画质一般,类似于1915年中国古物陈列所出版的《周铜器》,阴影部分灰度层次差别小,着色浓重,而边缘部分又十分淡漠。

本图录所收的38件铜器有16件有铭,全部都来自当时日本的大藏家:住友家族的吉左卫门藏器17件,天皇藏器4件,田中光显藏器3件,鹿岛岩藏器2件,中野钦九郎藏器2件,内贵甚三郎、田中源太郎、岩崎弥之助、三崎龟之助、说田彦助、太田资迈、德川家达、大给恒、鸟尾小弥太等各家藏器各1件。器物按照鼎、尊、罍、彝、卣、壶、觥、敦、豆、鬲、盂、匜、盘、洗、簠、斗、鎛、鼓,其中三代器盖有31件,伪器2件,汉铜器7件。

图录只有铜器的题名照片及有铭拓本的照片,所有的说明文字均成书单行,即《帝室博物馆鉴赏录·古铜器·解说》一书。此书中所有住友家族的铜器说明由高田忠周撰写。高田忠周(1861—1946),日本著名的书法家、说文学家、汉学家,对中文古字体颇有研究,著有《古籀篇》《说文疏义》等书。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传统的汉学教育,学习《说文解字》等书,沿袭了清代学者的研究范式。^②虽然高田本人一直从事着三代文字考释的研究,但是他的路数没有跳脱清代小学的范畴。住友家藏器之外的铜器说明则由中井敬所撰写。中井敬所(1831—1909),日本著名篆刻家,大正时期篆刻“保守派”代表。^③中井对于中国古文字的识别显然有一定的水平,但是对于文字字体之外的内容则所论无几。《解说》的体例仿照《西清古鉴》,包括尺寸、外观特点、字体特点及断代等。高田对于铭文的隶定和阐释比较准确详细,体例也完全遵循中国传统金石学的模式。

《泉屋清赏》

^① 参见《帝室博物馆鉴赏录·古铜器》之序,东京:帝室博物馆,1906年。

^② 文字俱楽府:《学界の巨人竹山高田忠周先生》,东京:文字俱楽府,1919年,第2—4页。

^③ [日]久米雅雄:《日本印章史の研究》,东京:雄山閣,2004年,第161页。

泉屋博物馆是日本住友家族蒐储并展示其收藏的美术馆。住友家族自从第十四代住友友纯开始便广泛收集中国的文物，其继承者住友春翠则将住友家族的中国青铜器及铜镜的收藏发展至极致。住友家曾于1911年至1916年将其所藏青铜器及铜镜摄影编辑分册刊行，名为《泉屋清赏》，共六册，青铜器、铜镜各收录九十件。1918年始，住友家族请滨田耕作、滝精一、内藤湖南、原田淑人等人重新编辑其藏品，并请国华社制版印刷。1921—1922年，《泉屋清赏》五册本终于正式出版，其中彝器部三册，镜鉴部二册，收录青铜器一百七十一件，铜镜一百件，该版本同时有英文本发行，彝器、镜鉴各一册。1922年，《陈氏旧藏十钟》一册别行，收录了住友家买下的陈介祺所藏的十件三代青铜钟。^①1924年，五册本《泉屋清赏》合并英文版重新制版，共计六册，日文英文双语，彝器部四册，镜鉴部二册。1926年，刊行《泉屋清赏续编》，仍由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编辑，分彝器部、镜鉴部二册，编号接续五册本《泉屋清赏》，彝器部之编号起于一百七十二，终于二百三十，共收录五十九件青铜器，其中三代青铜器二十件，汉器两件，铜剑四件，带钩十三件，杂器八件，造像十一件，铜棺槨一件。镜鉴部本计划由原田淑人编纂，然而正值原田欧游归来，事务繁多，于是交由梅原末治编纂，这是梅原末治为住友家族编纂图录之始。梅原末治基本遵从了原田淑人在《泉屋清赏》五册本中的编纂范式，以纹饰类型及铭文字句命名铜镜。铜镜编号起于一百一，终于一百四十，共收录铜镜四十件。1934年，住友家请梅原末治将正续编及别集去伪存真、重新编排，是为《删订泉屋清赏》。本书于泉屋博物馆之藏品并无增益，仅仅在《泉屋清赏》正编五册续编二册的基础之上加以择选，偏重点在于器物考古类型学及艺术史学的价值而非中国史徵文献之副的价值。本书共收录五十三件铜器，二十二件铜镜。书中有滨田耕作《支那古铜器概说》及梅原末治《支那古镜概说》，全面反映了滨田耕作及梅原末治所代表的“京都学派”在1925年至1934年十年间其理论及方法论的成形与独立，是学术史重要的参考资料。

《董龢吉金图》

斋藤悦藏藏器并编，大正十三年（1924）大阪出版。罗振玉题书名，内藤虎（即内藤湖南）作序。本书共收六件青铜器，每器均有尺寸说明（日本折衷尺）、铭文释文及照片，六器分别为：田父辛方鼎、田父甲彝（实际为簋）、田父甲卣、田父甲罍、田父甲爵、蟠夔觚。根据罗振玉的考证，这六件器物是1918年山东长清出土的，随后渡海东瀛为斋藤所收。其可贵之处在于来源于同一出土地的同一组器物得到了完整的收藏。

《周汉遗宝》（图1）

1932年春，日本帝室博物馆举办了一届“周汉遗宝”展览，本书即为该展览的图录。本书共收录三代至汉的陶器、铜器、玉器、石器、漆器等物122件，日文英文双语，器物照片均收录。当时，日本的考古学正在快速发展当中，随着殖民侵略的推进，日本的考古工作也在推进当中。虽然这次展览的展品还仍然依靠当时日本收藏家的助展，但也有不少器物是日本在朝鲜乐浪郡遗址考古挖掘所得，一定程度上带有展示日本考古学成果的意味。本图录由原田淑人编纂，与1906年中国青铜器展图录的最大不同在于，此书用考古学的框架来编次物品，其排序大致按照器物时代来排列。

^① 陈介祺对其所藏十件三代青铜钟颇为重视，曾治印为“十钟山房”以作明己收藏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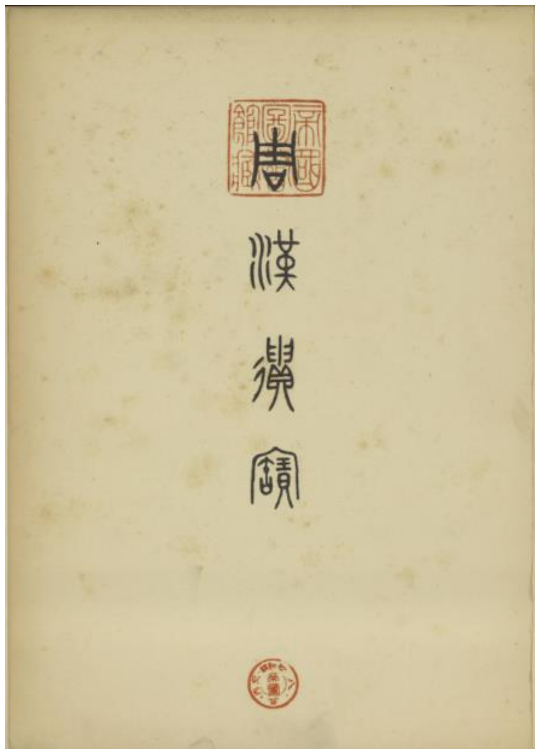


图 1

原田淑人（1885—1974），日本考古学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担任过东京大学教授，东京帝国博物馆鉴定官、历史课课长等。其在考古学上的成就，主要是通过各种遗迹和遗物研究东亚古代文化。原田淑人和滨田耕作同被视为日本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但一般认为，“原田考古学”与“滨田考古学”存在区别。滨田耕作（1881—1938）早年留学西洋，专攻西洋考古学，归国后成为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研究室首任教授，被认为是日本近代考古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特别注重运用西洋先进的近代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从事教学和实践，讲究野外调查，将文献当作考古调查的辅助资料。而“原田考古学”与之有所不同。他从小受汉学熏陶，后又在东京帝国大学专攻文献学，因而重视将汉文典籍与考古遗物密切结合以考证问题。

本书中共收录三代铜器 31 件，秦权量 2 件，汉器 16 件，其中汉代铜器有一半出土于朝鲜乐浪郡，还有 6 件铜制兵器时代不明，大概为战国至汉代的器物。原田淑人对于器物的情况加以说明：主要有尺寸、纹饰特征、时代推断等，铭文仅仅隶定，不加解释。所有器物的图片都是全体照片，铭文及细部纹饰不单独拍摄出图。在器物命名上，原田淑人采用“纹饰+器类”的命名方法，器类排列顺序大致如下：鬲、豆、甗、鼎、盃、壶、彝、尊、卣、爵、斚、觚、钟、兵器。由于玉器石器也穿插其中，其实我们并不能断言原田淑人在编纂图录时遵循了多么严格的准则。恐怕要充分考虑到这一展览展陈时候的设计，例如，所有乐浪出土的器物集中放在了图录的最后，而玉器则因为其上的纹饰与某些铜器相似，而杂列在三代铜器之间。

《白鹤吉金集》

内藤虎次郎监修、梅原末治编纂，日本兵库县白鹤美术馆印行，小林写真制版所印刷，1934 年。书前有长尾甲题端“千古法物”，正文后有白鹤美术馆主事山本规矩三跋文。

《白鹤吉金集》是白鹤美术馆出版的著录其铜器藏品的图录。白鹤美术馆是嘉纳治兵卫第七代嘉纳鹤堂（1862—1951）筹建的私人博物馆。嘉纳鹤堂自明治三十年（1897）开始广泛收集古董，1934年建成白鹤美术馆，同年出版《白鹤吉金集》。其实，1907年，嘉纳鹤堂将自己的藏品出版，是为《白鹤帖》，然而其中铜器甚少，更无三代铜器。真正收录三代铜器的图录始于《白鹤吉金集》。

1934年3月，白鹤美术馆开幕后，在5月举行了一次青铜器展览，《白鹤吉金集》就是这次展览的图录，由梅原末治编纂。共收录了五十件中国铜器，铜器与铜镜分列，每大类下按照年代排列，时代之下又大致按照器类编次。铜器大类下，“周时代”彝器二十件，有鼎、尊、卣、鬲、爵、斚、觶、方彝八类铜器；“战国”盘一件；“所谓秦铜器”三件；汉器五件，分鼎、壶、炉、量斗四类；六朝至唐的铜器五件，主要为炉、壶、盘。铜镜共十六件，分为秦、六朝、隋、唐四个时期。

书中每一器都用日文及英文标注题名、时代及尺寸，解说部分为日语，简论器形特征，器类用途，纹饰特点及断代的推测。如果有铭文，则附铭文拓本图像及释文。每一器都有照片图像，照片十分清晰，印刷质量上乘。梅原末治在器物断代上较为保守，很谨慎地不把任何铜器定为殷商器，本书中多件青铜器被定为周铜器甚至战国铜器。梅原氏非常注重器物纹饰、形制及铭文的系联。由于在此之前梅原末治已经编纂过《欧美蒐储支那古铜精华》，因此在揭示器物信息方面表现出比中国学者更为广阔的视野，非但对中国本土的金石著录书目十分了解，对欧美公私收藏家及古董商的收藏情况也十分熟稔。

1951年，白鹤美术馆又出版了《白鹤吉金撰集》，梅原末治编纂，收录了该馆后续收藏的铜器五十五件，编纂体例一同《白鹤吉金集》。本书共收录三代青铜器三十四件，有河南安阳出土的铜器四件，洛阳出土的铜器四件，洛阳金村出土的铜器二件，陕西出土的铜器三件。青铜器的命名仍然采用纹饰特征命名的方法，编次上分殷、西周、东周三个时间段，殷商的青铜器主要为酒器，按照卣、觥、尊、方彝、爵、觚、鬲排列；西周的铜器则按照鼎、簋、鬲、尊、卣、爵、壶排列；东周的铜器则按照鼎、卣、尊、壶、鬲排列。在本集中，梅原承认了铜器可以断代至殷商。

二、欧美编纂中国青铜器图录举要

Archaic Chinese Bronzes of the Shang, Chou and Han Periods（商周汉的中国古铜器）

一册，Parish-Watson & Co.藏器，Berthold Laufer 编著，纽约 Parish-Watson & Co. Inc 1922 年出版，书前有 Laufer 自序。

从其曾经出版过的关于中国、阿拉伯、波斯古物的情况来看，Parish-Watson & Co. 是纽约较早经营东方艺术品买卖的古董商。^①这本出版于 1922 年的书是目前所知美国最早将中国青铜器独立编辑成册的专门图录。

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德国出生的犹太人，是中国学界熟知的东方学家、汉学家。1893 年 Laufer 在柏林大学跟随 Wilhelm Grube 攻读汉学，1897 年获得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1898 年移民美国。Laufer 通晓汉语，日语，藏语，曾于 1901 年—1904

^① 1917 年该公司曾经出版过 *Chinese Pottery of Han, T'ang and Sung Dynasties*（汉唐宋的中国陶器）。

年, 1908年—1910年, 1923年多次在中国进行长期考察, 其著作主要关于中国之语言、民俗及艺术。本书收器十件, 9件三代器, 一件汉代鎏金壶。每一器下都有器物类别、尺寸、重量以及时代等著录信息。

Chinesische Bronzen aus der Abteilung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an den Staatlichen Museum Berlin (柏林博物馆东亚艺术部藏中国青铜器)

一册, Otto K ümmel 编著, 柏林 1928 年出版, 德文。正文前有 Otto K ümmel 自序。

此图录收录了东亚艺术部所藏的中国青铜器, 共计二十六件。在铜器编次方面, Otto 显然还是按照器物时代和形制来编排的, 但却并不严谨。Otto 把其所定的汉代器物诸如洗、奩、鐙之类放在了最后, 然而之前的器物则是“大约非常早”与“秦”相杂混。并认为“秦式”代表了从三代器到汉器之间的过渡形制。本图录收录的器物为鼎、鬲、簋、爵、盃、壶、罍、甗、鉴、钟、鐃、鼓、鐙、洗。

Summlung Oskar Trautmann (《使华访古录》)

Oskar Trautmann 藏器, Gustav Ecke 撰, 容庚拟中文书名, 孙壮题签, 正文为德文, 所有器物均有照片图版, 北平 1939 年出版。

陶德曼 (Oskar Trautmann, 1877—1950) 于 1935—1938 年间任德国驻华大使, 收集了很多中国青铜器, 此书即为其藏品的图录。本图录中的青铜器主要来自于北平的古董店, 而且陶德曼十分清楚这些铜器可能的出土地点为当时的安阳、浚县、洛阳以及其它遗址。

艾克参考容庚的《殷周礼乐器考略》为相关器物厘定类型, 分为鼎、方彝、簋、壶、卣、觚、觶、爵、角、盘、甗几类, 共 20 件, 17 件为殷商及西周早期器物, 3 件为战国时铜器。每一器物下均有简短的解说, 包括尺寸、纹饰、铭文 (隶定的), 出土地点。本图录收藏中的很多铜器本来为黄濬收藏, 曾著录于《邶中片羽初集》《二集》及《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初集》^①。图录中的实物照片非常清晰, 印刷也十分精美, 同时还收录了细部纹饰的拓片。

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Bueingham Collection (柏景寒所藏中国铜器图录)

一册, Charles Fabens Kelly 与陈梦家合著, 美国芝加哥 The Lakeside Press 1946 年出版, 英文。书前有 Daniel Catton Rich 序。

本书收录了 Kate S. Buckingham 收藏的 400 余件中国青铜器, 编纂者 Charles Fabens Kelly (生卒年未详) 是研究图案设计的艺术史学者。其著作有 *A Text Book of Design, Design In Landscape Gardening*, 后来其研究兴趣转入东方艺术, 并曾担任芝加哥大学艺术学院的东方艺术部负责人^②。

本图录共收录 48 件铜器, 直接分为三章: 商铜器、周铜器、汉铜器。商铜器有面具、鼎、鬲、罍、觚、尊、簋等类共 9 件。有趣的是, 一件端方旧藏的商鼎被放在了商器的最后一件, 且对于这件器物光滑无锈迹的特征进行了解说, 可见编者有意识地将出土器和传世器分开著录。周铜器下各类铜器先按照西周早期、西周晚期、东周、战国或更晚这几个时间段分割, 然后再按类排列, 涉及的器类有簋、尊、方彝、卣、罍、壶、盘、面具、钟、鐃、炉、簠、鉴、鼎、扁壶、带钩、盃、衡、杯、铜镜等共 31 件。汉器有鐙、锤、匱、簠、扁壶、

^① 黄濬:《邶中片羽初集》, 北平, 1935 年;《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初集》, 北平, 1936 年;《邶中片羽二集》, 北平, 1937 年。

^② Charles Fabens Kelly, *Design In Landscape Gardening*, Boston: Century Company, 1914.

铜镜 8 件。本书在中国年代表上与过去之西文专著有所不同，第一，以盘庚迁都作为重要历史事件将商代一分为二；第二，引入了春秋、战国的观念，并依照平王迁都洛阳及《春秋》纪事的最后一年为“春秋”限定期限并给出了对应的确切公元纪年；第三，限定“秦代”为战国之秦国统一六国之后至秦亡这段时间。

A Description and Illustrative Catalogue of Chinese Bronzes, acquired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John Ellerton Lodge (洛奇任内所得中国青铜器图释录)

一册，弗利尔美术馆 (The Staff of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编纂，“弗利尔美术馆东方丛书之三” (Freer Gallery of Art, Oriental Series, No.3)，美国华盛顿 (Washington D. C.) 1946 年出版，书前有 A. G. Wenley 的英文序言。

本书收录了 John Ellerton Lodge (1878—1942) 在 1922—1942 年间担任弗利尔美术馆馆长时入藏的 54 件中国青铜器，并对这些青铜器进行了说明和考证。这些中国青铜器十分精美，代表了美国公立收藏单位对于中国青铜器收藏的较高水平。此书虽题名为美术馆员工编纂，但实际上对于青铜器的全部整理考证工作主要由 John Alexander Pope (1906—1982) 和 Archibald Gibson Wenley (1898—1962) 担当，该项工作完成于 1944 年。^①本图录的结构分为介绍 (Introduction)、年表、参考书目、图像及说明以及最后的索引。编者参考容庚的铜器分类方法为青铜器定器类，共收有罍、鉴、觶、钟、爵、盃、彝、觚、觥、簋、壺、豆、尊、敦、卣、孟共十七种器类的三代青铜器 27 件，铜镜 10 件，装饰性杂器 4 件，戈、刀、戚、剑等兵器 13 件。在断代上，本书分为商、西周、东周、秦、前汉、新王莽、后汉几个时代，本书编纂体例完整、阐释文字细致深入，是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在中国青铜器研究方面的里程碑著作。^②

Asiatic Art in Private Collections of Holland and Belgium (荷兰及比利时私人藏亚洲艺术品)

一册，Herman Floris Eduard Visser (H.F.E. Visser) 编著，阿姆斯特丹 De Spieghel Publishing Co. 出版，1948 年，英文。

Herman Floris Eduard Visser (1890—1965)，荷兰东亚艺术学家，曾任阿姆斯特丹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 (Museum of Asiatic Art, Amsterdam)，撰写过研究中国艺术的专著等。^③他在 1940 年后一直积极蒐集荷兰、比利时、柏林等地的东方艺术品资料，并于 1948 年公布了他的收集成果，即本图录。^④

本图录收录了荷兰以及比利时诸多私人藏家手中的东亚艺术品，主要是中国以及日本的古代艺术品，共计 370 种，种类繁多，包括漆器、新石器时代陶器、瓷器、中国及日本绘画、中国古玉器、中国及日本的铜佛像、中国青铜器等。其中中国青铜器有 21 件，主要收录了青铜礼器 (Ceremonial Vessels)。铜器十分精美，且无伪器。

^① 1944 年 Pope 不得不服兵役，1946 年才回到弗利尔美术馆，他对此书的编纂工作与 1944 年完成，而最后的审定等事宜则于 1946 年完成，故而此书也在 1946 年出版。参见本书 Wenley 的序以及 Thomas Lawton, John Alexander Pope, *Archives of Asian Art*, Vol. 36,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3, p.89。

^② Laurence Sickman, review: *A Descriptive and Illustrative Catalogue of Chinese Bronzes, acquired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John Ellerton Lodge*, *Artibus Asiae*, Vol.11, No.1, 1948, p.148.

^③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德文版 *Chineesche kunst*, Gravenhage: M. Nijhoff, 1927.

^④ *Chinese Studies in the Netherland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olland: Brill Academic Pub, pp.30-232.

本图录中青铜器的命名完全用中国器类的威妥玛拼音表示，涉及到的器类有鼎、鬲鼎、卣、觚、斚、爵、簋、觶、尊、方鼎、彝。青铜器基本上按照时间排列，分为商、周早期、周中期三个时间段。每一时代下器物大致按照器类排列，只有卣除外，本图录共著录3件卣，均被定为商代，然而却分散在鼎、簋、爵之间。究其原因，乃是因为这三件被称为“YU”的器物，除了第三件是典型的有提梁的壶形器之外，其他两件均无提梁，而且第一件似觶而第二件似彝。如果根据中国学者对于“卣”器类的认识，前两件恐怕都不能称为“YU”。此外，有些青铜器的器类虽然用了中国器类的名称，其所对应的器物却完全不对应中国器类的定义，比如所谓的“Fang Ting”（方鼎）其实是一件四足圆鼎。

Visser 大胆挑战了高本汉在 Yin and Chou 的铜器断代观点，比如高本汉认为“亚”铭是判定器物为殷商器的充分条件之一，可 Visser 则在纹饰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其中的一件带有“亚”形铭文的方鼎（No.19）的时代应当在周早期（Early Chou）。

关于青铜器物的说明均在目录 Catalogue 中，简要说明了时代、尺寸、重量、锈迹、铭文等信息。所有的青铜器均有照片，若有铭文，则在照片前专设一页收录铭文的拓片。共计14件有铭文，这些铭文均收录于《殷周金文集成》。

Selected Chinese Antiquiti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Gustaf Adolf, Crown Prince of Sweden（瑞典王子古斯塔夫阿道夫藏中国古物选辑，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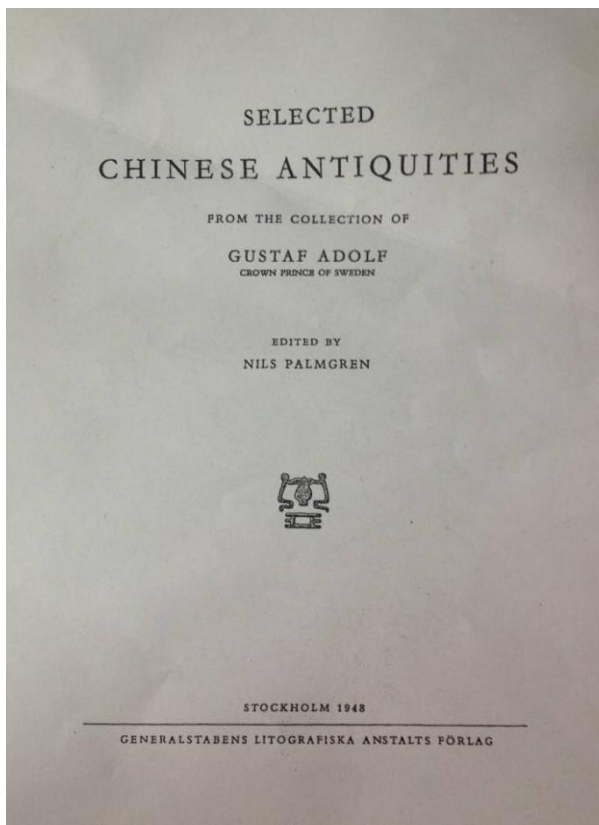


图 2

一册，Nils Oscar Emanuel Palmgren（1890—1955）编纂，斯德哥尔摩（Stockholm）1948年出版，英文。

如同大多数欧洲的中国古物收藏家一样，瑞典王子 Gustaf 自从 1907 年收集到了一间乾隆年间的中国官窑瓷器之后，便开始了他的收藏之路。他的收藏品很多，真正的中国青铜器

却不多。本图录的编纂人 Nils O. E. Palmgren 则是当时瑞典著名的东方艺术史学家，尤其在瓷器方面颇有研究。他曾经写过研究中国陶瓷的论文，还参与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考古发掘工作。1934 年，Nils O. E. Palmgren 前往中国收集瓷器、陶器、青铜器及玉器等古董，这次中国之行 Palmgren 的收获在于购得了大量宋代瓷器。这些古董在其回国后很快便成为了瑞典皇室的收藏。因此，当 1948 年瑞典王子 Gustaf 要为自己的收藏出一本精选集时，Nils O. E. Palmgren 就成为了自然的编辑人选。^①

本图录选录了 21 件中国青铜器，然其排列顺序没有什么规律。本图录在说明文字中详细记录了青铜器的大小与尺寸以及可能的出土地点，其断代方面明显遵从了高本汉的断代方法，分为 Yin 殷、Chou 周、Huai 淮三种时代。由于 Palmgren 具有考古学及艺术史学的知识背景，故而，我们能在本图录中看到其对于纹饰的极大关注，他不但把所有的青铜器纹样仔细地描摹下来，而且还尽最大的努力把这些纹样与当时中国及西方的青铜器图录中所出现的相似纹样进行排列比对，以求为原器在中国青铜器艺术谱系中寻找合适的坐标。同时，Palmgren 还在目录前加上了中国地图和年代表，以资读者参考。由于本图录旁征博引了众多资料并且在纹饰研究方面有深入的探讨，故而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被当做“研究中国艺术的学生所必须参考的重要著作”。^②

^① 关于 Nils O E Palmgren 的经历请参看 *Svenskt biografiskt lexikon*（瑞典传记辞典），这套辞典出版于 1917 年，截至 2013 年已出版 33 卷，然而中国境内没有此书。瑞典 Art av Barbro Schaffer 资助出版了这部重要传记辞典的电子版，瑞典文，<http://sok.riksarkivet.se/SBL/Start.aspx?lang=se>。本文参考的所有资料来源于该电子版，其永久标记地址为 *urn:sbl:7997, Svenskt biografiskt lexikon (art av Barbro Schaffer)*。（2013.6 检索）

^② John A. Pope, Review: Selected Chinese Antiquiti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Gustaf Adolf, Crown Prince of Sweden by Nils Palmgren,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10, No.1, Nov. 1950, p.89.